

星火燎原革命新路

大革命失败后，在全党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探索中，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南下时，决定选择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因为：这个地区在大革命时期各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当地的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都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这里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易于部队筹粮；地处两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

1927年10月中旬，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部和唐生智部发生战争，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这是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良机。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担任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2月中旬，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第一次“进剿”。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砦市会师。会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从此以后，他们领导的军队被称为“朱毛红军”，是令国民党军队闻之胆寒的部队。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地方武装有很大发展。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共有两万余人，成为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尤其重视军队建设。1927年底，他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8年4月，他又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当时称“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红军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和军队的建设，早在井冈山时期就认识到，

“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后，在军队建设问题上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但他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前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8月，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信分析了红四军党内的实际情况，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对于红军中的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指示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样，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召

开。这就是古田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信。大会通过了八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只是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等思想倾向。决议强调要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教育工作。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指明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指出以后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党员的条件是：(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后来在各地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到1930年6月，全国已先后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分布在十多个省的 300 多个县，全国红军发展到约 10 万人。农村革命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是同土地革命分不开的。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在根据地建立之初，分田地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的逐步巩固，1928 年 5 月至 7 月，边界各县掀起了分田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广大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后，这个地区的土地革命即迅速开展。根据党的六大精神，1929 年 4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同年 7 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原赃会后，在闽西 300 多里的地区内进行了分田，60 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与此同时，在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广西右江、广东琼崖等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31 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

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对土地问题的态度和解决方法是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土地纲领是不坚决、不彻底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则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国民党有时口头上也讲“耕者有其田”，但根本没有实行。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坚决地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向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

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得以坚持和发展，关键就在于党紧紧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后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1930年10月，蒋、阎、冯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蒋介石立

刻集中兵力向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多人，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拥有4万多人。10月3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敌情，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12月30日，红军在龙冈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近1万人，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又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其他各路敌军仓皇退走。龙冈、东韶两仗共歼敌1.3万人。红一方面军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不久，蒋介石又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自1931年11月16日至31日，红军从富田开始，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中央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硝烟刚散，蒋介石便在明间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经过历时3个月的作战，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此次“围剿”被粉碎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1932年5月，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他的战略部署分两步走：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后再

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约有7万人。这次反“围剿”是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进行的。他们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在1933年二三月间，经黄陂、草台岗两次伏击，歼灭国民党军3个师，俘敌1万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并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